

「独秀学术文库」

近代以来中国『大众』 话语的生成与流变

罗崇宏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独秀学术文库」

近代以来中国

『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

罗宗宏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以来中国“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 / 罗崇宏
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2
ISBN 978-7-5201-5657-8

I. ①近… II. ①罗… III. ①大众传播-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222528 号

近代以来中国“大众”话语的生成与流变

著 者 / 罗崇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5657-8

定 价 / 1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广西一流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经费资助成果

“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经费资助成果

序

黄卓越

文化研究、文化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学术场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难以尽述，而其中值得一提，又易被疏忽的一个侧面，便是促成了一种概念史的研究。尽管笼统地看，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一些以概念、范畴与术语等为题意的考订或撰述，但因视角与方法上的差异，与目前所能称道的概念史研究仍是非常不同的。在文化研究领域，该类研究的一个最具典范性的事例首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其通过将5个核心概念置于全书引领性的位置上，带动了对英国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文化批评”整个历史进程的图绘。威廉斯另有《关键词》一书，看似属于辞典性质的，但由于在选词与解说时，仍然隐含了对社会、文化与习尚等高度关注的系统化意识，因此也可将之看作概念史书写的一个配套产品。此后，文化理论、文学批评等领域也出现过一些以之为范例编撰的著述，均对我们从新的角度来审视概念的属性及其演化过程等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从完整的学理上看，通过一个或数个概念来探索一段历史的做法，也有其局限性，这是因为大量的社会观念流向并非都是以定型化了的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此，我在此前的论述中也曾提到，有必要进一步关注那些处在概念以外及未被概念化的思想动态，并对概念史（the history of concepts）与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两种叙述模式做出相应的辨析。由于历史表呈的多样性、混杂性、枝节旁生、泥沙俱下的特点，当我们以某些确定的概念去解说一种宏阔的思想走向时，虽然给出了问题的聚焦点，又事实上会面临另一重困境，即很难去决断概念史与观念史各自的边界，

以及它们的交汇方式。同样以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为例，尽管在最初构思该书的框架时，作者已经形成了用几大概念去组织全书的基本原则，但在进入撰写之后却无法控制那些溢出概念史框架的诸多内容，从而只能将大量篇幅放在对那些非概念化的“观念”的追踪中（见该书“导论”），以至在今天看来，该书倒更像是一种将概念史取向裹挟在内的观念史写作，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概念史著作。此外，如将概念史视为一套学术梳理的原则，也还会遇到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史”“话语史”等在界义上进行分疏的问题。

当然，在此我想将一些操作上的难度先提出来，并不意味着就此而否认概念史撰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书写方式所具的重大价值。概念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于人们都是用概念来思考的，这与语言之所以重要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思考与行动的方向，关于后者，在20世纪之后的语言学转向中也已有充分的论述，但是也需有所分辨，即在概念史名义下的所谓“概念”与一般的语言还是有所差别的，在概念史的视野下，语言并不是以均质化的方式分布的，而是依照它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存在着各种级差，以此而言，总有一些概念是处在上位的，有些则处在中位或下位。譬如威廉斯列出的那些概念，以及我们将要去讨论的“大众”等概念，均是在大量的语言中遴选出来，被视为带有十分突出的标符性意义，及具有思想与情感的高度聚合性、表意性的那一类词语，它们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中往往处在语言流动的上端，甚至会对社会的变迁起到某种疏导与“指示器”的作用，因而是既定“语篇”中的一些“关键词”。既然如此，对之的研究除了需要参照一般语言学的原理，也需要考虑到它们在被置于真实的社会场域中之后体现出的特点。

社会与学术等领域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大众”“族性”“表征”“物质主义”等，当然都不会凭空而来，而是都会有相应的指称对象，至少会有一模糊的“物”的指向，因此，对之的研究也不宜完全采用“建构论”或“想象论”的主张。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不等于回到反映论的模式中，以为概念与现实之间会存在一种必然的、合榫的对应关系，由此而去否认概念所具的构造性。关于这一问题，涉及20世纪以来的多场理论争议，似不便多加评说，但我想在此可以引入一个“使用”的概念，

对之做些补充性的解释。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事件或运动中，那些被用来投射某种意见或主张的概念，它们被寄予的含义都不是无辜的，而是与使用者对情势的判断，以及他们的态度、立场、目的、策略等有密切的关联，这也决定了人们在使用某些概念时组合现有材料，评价材料属性（或否定之，或认同之等）的方式，进而用这一具有明确导向的概念去指明、引发或推进群体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概念的意指当然不能游离于现实，以至失去来自事实方面的支撑，但另一方面，它也需要在使用中注入某种意愿及具有动力感与方向感的意含，使之携有强烈的感召力或批评性等，由此才能带来更大的扩散性效应。就此可见，那些处在上位的概念为何在社会、文化等活动中总是会成为具有优势性的语言，而对之的命名与解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总是会受到具有情境性重大目标的导引，这些都是寻常的词语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在时过境迁之后，解读者也可以通过对之的细致分析，去重新揭示隐含于其中的历史“密语”，以及概念被措用与使用的各种规则。而这样一种观察与研究的视角，在我看来，也可以称为是“话语史”的范式。

在研习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我曾经关注过 mass (masses) 与 popular 这样的词语，它们也是文化研究中出现频率甚高的两个“关键词”。我的关注点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英语语境中，那些代表性的学者与批评家是如何对这两个概念进行辨析，并将之投入意义之博弈中的；二是在当代汉语语境中，学者们又是如何转译这两个词，用以言述中国当代文化状况的，这也包含，其中哪些转译属于语境上的误植，因此需要有所修订与矫正；第三，如将笼统而言的“大众”放置在中西对比的历史场景中，又会呈现出哪些根本上的差异，是否可借之而梳理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属于中国本土的大众言说谱系。但由于我发表的这篇文章，描述出的还只是一个简要的轮廓，后来又受其他课题的牵累，未及将以上的思考付诸更为系统与详密的探讨，遂留下了一段未了的心愿。

罗崇宏于 2012 年从新疆来京，随我学习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等。崇宏对学术的钟爱与执着，以古人所谓“志者”与“痴者”形容之也不为过，聚书盈屋，博闻广览，每日均有札记，录其心得。不久，向我提出欲以梳理与构建中国近代以来的“大众”话语谱系为博士论文撰写的方向，虽然

我也知道此途甚艰，但因考虑到愈是艰难的课题愈能提升学者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可借之将虽已初步形成，却仍悬吊于半空的思路落实到实处，在充分展开之后为中国自身的文化研究实践提供一坚实与独特的范例，便欣然同意了他的设想。

由于这一课题涉及的时间跨度之长，资料本身又极为纷扰，想必崇宏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也遭遇过许多的困惑，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因文稿已经呈现在眼前，无须我再做过多的复述，只是就我最为关心的若干框架设计的问题再做些阐发。

首先是，如何理解概念史这一治学类型，从而将之有效地移植到学术操作之中的问题。毫无疑问，对之的思考，不仅需要解决好概念史所在的边际，同时也需要比较透彻地去消化与之相关的一些当代理论。在这方面，正如我们所见，这部著述是以确定的概念为中心循序展开的，始终未离概念的范畴，由此而保证了范型的“纯度”，这也可看作是作者为本课题所设定的一个主要边界。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又未落入过去流行的那种简单化的实证主义套路，而是更进一步参照福柯等理论家的主张，采用了“概念总是在话语中被言说”的说法，即以为概念从来都不是自足的，相反，它们总是被镶嵌在话语的模块中，由话语所生产出来。以本书集中讨论的“大众”这一概念为例，如按时代的进程加以排列的话，规定其概念言说的那些话语相应地就有启蒙话语、革命话语、消费话语等，这些更大的话语始终是在场的，并对概念的生产起到了指向性的作用，甚至也可将话语看作是概念的一个潜体系。如此一来，也就将对概念史的研究扩展为了话语史的研究。两者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层面上，然而却可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相互指呈、相互阐明的关系。虽然在具体的思考中（如崇宏也已触及的），也还需要插入一相关的中介，即存在着一个谁在言说，哪些人在言说，或具有某种能动性的“主体”在概念与话语之间会起到怎样的调适作用的问题，但借助这样一套思路，却在另一个侧路上打开了原来边界，通过内部论证（在语言论层面上的论证），将更为广泛的历史风云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这一理解与把握概念史的方式，我认为不仅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可获充分验证的。

其次，对概念史的研究其实也无必然的通则，仍然需要根据目标与语

境的差异形成一套自己的探索路径。以本课题而言，因为所要梳理的是一长时段历史，加之，尽管似乎有一贯通性的概念及其指称对象存在，但在不同的历史场合下却是以大量不同的语词表呈出来的，这样的话，也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在既不遗弃也不背离那些纷沓而至的多种词语原有命名与含义的前提下，将它们都切当地挂连到一个前后相续的线路上，由此形成一内在连贯、跌宕以进的谱系？这自然很难在过往的研究中找到仿效的样板，需要作者自己去摸索，进而寻找到一套合适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以为罗崇宏所采用的“层次处理法”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即首先将“大众”这一概念确定为这一家族系谱中的“总述语”，然后将依次呈现的“国民”“民众”“工农（大众）”“工农兵（大众）”“群众”“消费大众”等作为下一个层次的“分述语”，再将由这些分述语衍生出的概念（如公民、庶民、平民等）系于更下的一个层次中，由此不仅可以如实地反映出中国近代以来大众诸概念复杂生成的实际状况，也能在确保全书整体逻辑的情形下，将多语化造成的结构性张力勾勒出来。虽然将“大众”作为一个总述语，仍带有某种“控制”的痕迹，并非完全是自然的产物，也与英国文化研究对该语词的解释（从翻译的角度看）不甚相符，然而，在中国的语境中，考虑到其使用的频率与意义特征，人们对之的认知，以及其与译入语在含义上存在的固有差异，仍然可视之为最具代表性的，这在崇宏的著作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解说，参之即可。

此外，便是该项研究的出发点，也需一提。如上已述，这一课题的产生与酝酿，不会没有任何学术上的来源，准确地说，仍然与文化研究带来的启迪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事实上会有有一个国际性参照的背景。当然，从历史上看，这一所谓的国际化背景，一开始就已被嵌入在近代以来“大众”诸概念的生成及其持续后移的进程中，如早期提出的“国民”与 citizen、citizenship 之间的关联，“群”与 society 之间的关联，“平民”与 democracy 以及西方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关联，“工农民众”与俄国革命、共产革命的关联，直到 1980 年代之后中国精英知识界使用的“大众”与 mass、masses 这些词语的关联，均反映出了概念跨语际传递的效应，并可从中发现这一概念旅行的轨迹，尽管在新的语境中，这些概念仍然会被重新编码，以适应有所差异的土壤。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流

播及其对 mass 与 popular 等的论说，在当代知识界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从而促使我们更为深入地去思考本土的现状，并希望能在一种对比的视野中，梳理与辨识出中国自身的大众话语谱系。尽管这样的研究仍然会紧扣本土的经验展开，但如没有这一开放性的视野，最终形成的问题意识、问题架构也不会像现在这般。在这一领域中，若干学者也做过一些片段性的探索，有其自身的价值，然而我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整体化的梳理与展现，而罗崇宏所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

当然，一部著作的成功，并不局限于以上所述的这些在大框架上的思考与设计，除此以外，其他的一些质素与能力也都需要跟上，比如对材料的精耕细作与穷讨冥搜，对错综问题的辨析与分析，合适地去分疏与整合庞杂的现象，在各章节上使力的均衡度，以及警锐与深入的洞察力等，皆会在一件成品的打造中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而这些，似已不属于我的评述范围，还是交给更为高明的读者去判断为是。

2019 于北京海淀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大众”概念问题的展开	001
“大众”研究的历史与视角	009
第一章 “国民”的现代性转型	028
第一节 “大众”话语溯源与批判	033
第二节 “臣民”到“国民”的“现代”转型	037
小 结	079
第二章 “民众”话语的现代性发展	081
第一节 “平民主义”与“民众”话语	083
第二节 “到民间去”与“民众”话语	096
第三节 “民众”话语的深化	101
第四节 “主流”之外的“民众”	114
小 结	128
第三章 “革命”语境中的“工农”大众	130
第一节 “工农”大众话语论竞争	132
第二节 “左翼”语境中的“工农大众”	145
小 结	177

第四章 “革命”语境中的“工农兵”大众	178
第一节 “工农兵”大众话语生成	179
第二节 从“工农兵”到“人民”言说	192
小 结	199
第五章 “和平”语境中的“群众”	201
第一节 “工农兵”话语的传承与断裂	202
第二节 走向“社”姓的“大众”——“群众”话语的生成	210
小 结	220
第六章 比较视域下的当代“大众”	221
第一节 当代“大众”话语转型	224
第二节 当代“大众”话语分化	247
结语：中国“大众”理论建构	266
参考文献	271

绪 论

“大众”概念问题的展开

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用语不断地充斥着我们的眼球，与之相关的“大众消费”“大众文化生产”等新概念不断涌现。而近代以降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大众”这一概念在经历了“启蒙现代性”的蜕变和以“阶级”为内核的话语整合，最终演变成了当下文化视野下的以“消费”为特质的“大众”。这个表征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指示器”的概念，在经过了近100年的建构和重构之后，其概念所指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们还使用“大众”这一称呼，然而当下以“消费”为语义内涵的“大众”与近代以来以“阶级”为分类标准的“大众”截然不同。造成“大众”语义演变的动力主要源于不同的言说语境，比如在“革命”话语时代，“大众”会被言说成革命的主体力量，而“生产”和“消费”语境中“大众”则被看成消费的主体，等等。

当然，“大众”言说的多样或“面目全非”也非仅仅因于中国本身的话语实践，也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概念的移译与使用中的不加分辨有关。

就西方而言，比如在以“伯明翰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为中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大众”一词一般是用“Popular”和“the Masses”分别来表示。但是在中国语境中理解与翻译这两个词时，则往往仅使用“大众”来表示，由此便造成了理论上与理解上的含混。就西方“大众”话语谱系而言，首先要追溯到英国以马修·阿诺德和F. R. 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知识

分子，他们以“the Masses”为言说核心将大众视为没有文化辨识力的“庸众”^①；而以雷蒙·威廉斯为代表的左派文化理论家则以“生活方式”的文化视角建构起“Popular”大众观^②：“大众”是文化的接受者，但同时也有抵抗性，他们承认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但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有所思考以及携有某种程度的抵抗。也就是“抵制行为被权力所包容，并且没有构成威胁”^③。

进一步说，在西方，“the Masses”概念一般是从文化上进行归类的，指的是低级的文化群体，进而成为批判的对象；这种言说旨在作为高级文化的一种防御型话语，因而往往会有意识地取消阶级的划分标准，“利维斯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都是如此。而“Popular”，一般可以译成“民众”“通俗”等，它有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有时又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④这个概念中尽管在初期也包含有阶级（民众）的意识（因为源自左翼话语），但是1960年代之后随着“无阶级意识”的普行，“Popular”这一概念更多地偏于“通俗”的含义^⑤，因此也属于一种文化上的界定。

可见，西方的“大众”既是被不断建构的一种文化观念，同时也对应着现实中的特定人群。继而形成了带有西方特色的文化意义上的“大众”理论。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的“大众”言说谱系的确立，却有着自己的路径。从较早的起源上看，一般需要从“臣民”的现代性转换说起，并经历大致几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是“臣民”向“国民”的变化。中国历史发展到晚清，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西方启蒙思想的催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要求所

① Leavis, F. R., *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Cambridge: Minority Press, 1930.

②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③ [英] 诺曼·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殷晓蓉译, 华夏出版社, 2003, 第53页。

④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0.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针对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大众”进行了反驳，提出“大众”只是被看的方式，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即文化）。

⑤ [英] 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刘建基译, 三联书店, 2005, 第281–289页。

形成的“合力”，使得“君—臣”模式的“臣民”逐渐转化为具有“民主”内涵的现代“民”。一批早年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从日本这个“中介地”引进了具有启蒙色彩的“国民”概念，与传统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臣民”^①相比，现代的“国民”则是“权利”和“义务”兼有。同时，在“国民”话语言说过程中，逐渐形成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国民”言说，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国民”言述。他们都以“民”为“国”之“民”，所不同的是“革命派”“国民”言说的根本前提，是把“民”建基于以“三民”“共和”为核心的“国”之上，而不是“维新派”在保持晚清帝国政权前提下的“国民”言说。显然，“革命派”的“国民”言说代表了时代的前进方向，以至“维新派”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后来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逐渐向“革命”的“国民”话语靠拢。

到了五四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联“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宣传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民众”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从而奠定了以左翼话语整合大众概念的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农民众”话语可以视为“工农大众”话语生成的过渡性言说，这两种话语言说都以“工农”为话语主体，且以“阶级”为群体分类的标准。不同的是，从“国民”到“工农民众”话语的流变，以“工农”作为话语主体经历了缓慢的演绎过程，大致是城市青年→工人→农民，“民众”队伍呈现渐次增大的趋势。

从1928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工农民众”为“工农大众”所取代。此时的“大众”概念主要自日本“旅行”而来，并深深地打上了“左翼”的“阶级”烙印。换句话说，20世纪有中国特色的以“阶级”为中心的“大众”话语至此正式生成。这当中，“工农大众”话语又有

① 当然这种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臣民”不能概括中国传统的“民”的形象。传统的“民”也很复杂，既有被压迫的失去主体性的“民”，也有“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的主体性的“民”。因此，近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所言说的“臣民”是以偏概全式的建构起来的用以与“国民”相对应的概念，属于建构论意义上的话语形象。

“化大众”与“大众化”的区分，即“大众”话语从“化大众”向“大众化”流动，相应地，言说者也从知识分子转移到以革命领袖为主。这一时期的“大众”话语言说指向是把知识分子“化”到“工农”之中。

自全面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工农兵”成为话语主体。由于言说语境从“民主革命”转向“民族救亡”，“兵”成为独立的概念进入大众话语。“工农兵”话语遂成为此后直至1970年代末一体化的“大众”话语主线。

需要说明的是，1970年代末的“大众”话语虽然延续了“工农兵”言说，但是由于言说语境由“革命”到了“建设”，话语主体发生转变，“工农兵”大众用语在很大程度上被“人民群众”所取代，最明显的是“兵”再次从“大众”话语中游离出来，“人民群众”成为话语主体。“人民”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话语符号，与“民主”相对应，成为区分敌我的“标尺”。

到了1990年代初期，“大众”概念基本上没有了此前“阶级”的含义，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带有消费性的文化概念。而这个概念与西方知识谱系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话语颇为类似，即都把“大众”视为缺乏辨识力的被动受众。不过在1990年代中后期“大众”言说又一次出现话语转向，即不再把“大众”完全视为“文化工业”的消极接受者，而是具有革命能力的大众，他们对文化专制具有革命消解的作用。当然，1990年代中期以后“大众”言说也并非只有一种声音存在，这其实也是各个时期“大众”话语言说的普遍现象，即大致以某种言说为主，而兼及其他“支流”话语。就199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大众”话语来说，其声音有批判、有肯定同时也有理性的反思，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引入，“大众”言说带有更为“中性”的色彩。

梳理完中西谱系中的“大众”理论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中西“大众”都是将所言说的群体放在一个大约共指的范围内，体现出一种含义上的不断变化与延宕的特征；其次，中国和西方“大众”理论的差异，主要源于两个不同的话语言说系统。在西方，“大众”话语从一开始便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而言，而这个危机则是由19世纪以来工业

主义所导致的。然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封建专制国家，尚未步入现代性的正规，因此有一个改造传统等级制的客观历史需求。显然一个是出于应对现代性已产生的危机，一个是基于走向现代性的诉求，这也决定了自近代到 1980 年代中国“大众”话语的变化会与现代性动员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

由以上针对中西大众言说的引述，本书试图从以下两方面入手进行思考：一方面中西大众话语实践本身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中西在大众概念措用上也存在含混与错位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就有必要重新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之中，梳理与厘定中国大众话语实践的整个进程，以便确切地认知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大众概念形塑的特点与含义，进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的“大众”言说体系。

如果从更为“本体”意义上说，本书所研究的“本体”就是“大众”概念/概念史，而“话语”则更体现为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之所以把“概念”“概念史”作为本体研究，是基于一种理论的目的或意义，因为历史沉淀于特定的概念之中，而概念本身有自己的历史（概念史），而在“概念史”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政治史”、“社会史”和“经验史”^①。这是“概念史”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本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大众”这个词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和 90 年代以后两个时期。其他时期更多使用的是类同的概念，如“国民”“民众”“庶民”“平民”“群众”等。虽然其含义有别，但所指的对象则基本相同，故此，为了有一个可以大致统一的表述，我们把这些类同性的术语均归入“大众”^②概念的“语义场”

① 方维规：《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评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原载《二十一世纪》2009 年 2 月。

②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大众”的概念既指所有时期的“总体语”，又指某一时期的“分述语”。具体地说，本书题目中的“大众”是指整个 20 世纪的这一群体的“总体语”；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 90 年代之后的“大众”可视为“总体语”的“分述语”。因此，如果没有特别指明，在各个历史时段出现的“大众”即视为“分述语”，而总括性的则为“总体语”，这需要读者在具体语境中稍加辨析。